



当前国际劳工迁移的六大新趋势

张仁开/上海市科学研究所 200235)

国际劳工迁移是指人们为工作需要由出生所在国或居住国迁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是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战”后,随着经济的普遍高速发展,一些国家因劳动力出现短缺而大量寻求国外劳动力,从而促使了国际劳工迁移的迅猛发展。从整体上看,当前的国际劳工迁移表现出六大新特点:迁移规模大型化、迁移方式多样化、迁移人口知识化、迁移方向多元化、迁移影响广泛化、迁移政策严格化。

一、迁移规模大型化

20世纪30年代,国际劳工首先在法国和瑞典出现,不过当时迁移的规模小、范围窄,并未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二战”后,国际劳工迁移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97年全球的国际劳工数量达4700万,比1945年增加了将近3000万,目前超过了7000万。促成当前国际劳工迁移规模大型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在加剧国际间资本和商品频繁流动的同时,也加速了国际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发展使得高级技术人才和经理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频繁;而区域经济集团化又使得普通劳动力在国际区域中的迁移成为可能。大部分国际劳工迁移发生在世界各个区域内部。这些区域往往在语言、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习俗上具有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区域内部各个国家经济上的差异常常是导致国际劳工迁移的重要原因。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劳工迁移变得越来越容易。二战后,汽车、大型轮船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飞机的民用化趋势,更是大大缩短了

世界不同区域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迁移的成本和时间,使较长距离的国际迁移活动变得愈来愈容易,从而加剧了战后国际劳工迁移的迅速发展。第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二战后国际劳工迁移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日趋扩大,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受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较高、经济发展迟缓等问题的困扰,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产生了劳工迁移的内在需要。第四,女性劳工大量增加。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香港、新加坡等开始招纳女性劳动力从事家庭服务、护理、服装加工和娱乐等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劳工迁移规模的大型化趋势。

二、迁移类型多样化

国际劳工迁移,按迁移的时间,可分为季节性迁移、短期迁移和少数事实上的永久性迁移;按迁移者的特征,可分为无技术(或半技术)劳工迁移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迁移;按迁入地和迁出地可分为洲内迁移和跨洲迁移等。二战前的较长时间内,国际劳工迁移规模小、范围窄,迁移的类型也比较单一。从迁移时间来看,绝大多数是短期迁移,时间一般少于1年;从迁移者的特征看,无技术劳工迁移是主要形式,而且男性占多数;从迁入、迁出地来看,多数是洲内迁移,跨洲迁移主要是从非洲、欧洲、亚洲迁往美洲,但数量远小于洲内迁移。二战以来,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迁移类型越来越多,表现出极大的

多样性特征。其一,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迁移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容易,季节性国际劳工迁移量开始超过短期劳工迁移量,迁移时间一般在半年之内。2003年,欧盟的一个抽样调查表明,从欧洲迁往美洲的200万劳工中,时间在6个月之内的达110万,超过18个月的不足10万。其二,由于各国对高级技术人才迁移的鼓励和对非技术劳工迁移的限制,再加上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发展,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国际劳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40年的1.5%,提高到1960年的4%、1980年的11%、2000年的17%,目前超过了20%。

三、迁移人口知识化

当前国际劳工迁移的另外一个趋势是迁移人口的技术化、知识化和高学历化。据美国的一个抽样统计,1980年美国劳务市场上的50万外国务工者中,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不足40%,目前高达80%以上,其中博士学位占30%,教授、高级工程师占25%以上。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高层次人才,而对一般人口的迁移采取限制性政策。对一些本国奇缺的高级科技人才,许多国家想方设法加以引进;而对非技术劳工的迁移,许多国家则严格限制,并规定劳工在合同期满后,必须返回原迁出国,有些国家甚至反对从国外输入非技术劳工,如日本1990年通过的法律重申了严格控制非法移民,但同时放松了专业技术人才来日本工作的限制。1990年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法,将劳工移民的配额从过去的5.4万提高到14万,并允许独立于家庭团聚移民之外的每年高达8万人的高级人才进入美国。加拿大也在1993

年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移民法提高了低技术工人移民加拿大的难度,放松了技术人才移民加拿大的限制。

四、迁移方向多元化

国际劳工迁移的流向不再仅仅是南北现象(即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劳动力南南流动(即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和东西流动(即劳动力从东欧迁往西欧)在国际劳工迁移中变得愈来愈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对国际劳工迁移控制得越来越严格,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了国际劳工迁移的新目的地。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要么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要么经济发展快、资本比较丰富。前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后者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大批东欧人和俄罗斯人不断涌向德国、瑞士等西欧发达国家。

五、迁移影响广泛化

国际劳工迁移会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产生影响,这已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二战”后,随着国际劳工数量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其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远。国际劳工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主要有:带来了众多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弥补当地劳动力短缺,但也可能加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抬升当地的失业率;给迁入地社会带来一些影响,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习惯一般存在差别,外国劳工的迁入,不可避免给当地社会管理、传统习惯造成影响。国际劳工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主要有:人才流失。与迁出地大多数人相比,国际迁移的劳动力一般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技能,属于“劳动力中的精华”,他们流出后形成的空缺被缺乏竞争力的、能力较低的人所填补,从而降低了迁出地劳

动力的整体素质。收入水平可能有所提高。国际劳工收入一般会通过汇款的形式流回迁出地,因此,迁出地的收入水平有可能提高。同时这些汇款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迁出国(地区)的外汇储备。据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开发署提供的资料,寄往印度的汇款在1996年只有40万美元,2003年则增长到200亿美元。寄往斯里兰卡的汇款在2000年到200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6%。而孟加拉国在1998年到2003年间增长了7倍。南亚的许多国家在平衡国际支出中已经开始依赖这些收入。2002~2003年度,孟加拉国GDP的5.8%是由汇款构成的,它支付了国家进口商品和劳务40%的款项;巴基斯坦的汇款收入占其1995~1996年度GDP的1.6%,到2002~2003年度则增加到8.7%。在东亚,汇款占泰国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3%增长到2005年的3.3%;韩国的这一比例2002年时为3.6%。

六、迁移政策严格化

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劳工迁移,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和对策,以避免国际劳工迁移给本国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各国关于劳工迁移的政策法规趋于更加规范和严格:许多国家

对国际劳工迁移的控制更严格。为了降低本国的失业率和减少国际劳工迁移给本国带来的难以预料的社会成本,许多国家对国际劳工迁移的控制变得愈来愈严格。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许多国家在边境口岸加强了控制,对非法移民可能出现的工作场所进行不定期的巡查,严格旅游和探亲访友签证的审批程序。有些国家还通过了雇主制裁法案,即对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进行惩罚。许多国家对产业进行调整以减少外籍劳工的迁入。面临国内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许多国家采取了新的对策和措施:一是通过采用新技术,对现行技术进行改造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布置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邻国。如日本在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并没有用输入外籍劳工的办法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而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布置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又便宜的亚洲其他国家;三是大力开发国内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如西亚各国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积极推行技术人才本国化的政策,而日本政府在本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时候鼓励企业聘用下岗的老年工人和妇女参与社会劳动。



藏族汉子与高原之舟

摘自2006.12《风景名胜》